

## CIDEG 十周年：青木昌彦学术思想研讨会



The banner features a green background with white and red text. At the top left, it says '10th Anniversary 2005-2015 CIDEG'. In the center, there is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logo and nam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On the right, the CIDEG logo and name are repeated. The main title '青木昌彦学术思想研讨会'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in the center. Below the title, the date and location '2015年10月25日 中国·北京 October 25, 2015 Beijing, China' are listed. At the bottom, there are three photographs of Akashi Masahiko: one speaking into a microphone, one in a suit, and one gesturing with his hand.

**主持人：吴敬琏**

**主题发言：钱颖一、星岳雄**

**发言嘉宾：白重恩、李波、周黎安、车嘉华、薛澜、赖海榕**

吴敬琏：青木昌彦教授是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经济学家，他在很多学术领域都获得了很高的成绩。他做的不是纯理论的研究，而是通过对现实的经济发展、制度变迁进行深刻的观察，并从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纪念青木先生，最重要的就是学习他的治学精神，学习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并使他的学术成就能够发扬光大。所以我们现在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对于青木昌彦教授的学术思想进行研讨。我们邀请了两位学者进行主题发言，一位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另外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星岳雄教授。在开始他们的主题讲话和我们的讨论以前，请各位先看一个录像片。

（播放视频）

吴敬琏：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一位主讲人钱颖一教授。

### 钱颖一：青木昌彦与比较制度分析

我是在 1990 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时结识青木昌彦教授的，至今年整整 25 年。7 月 15 日我在从北京到波士顿去哈佛大学参加马斯金教授 65 岁学术研讨会途中换飞机时得知他去世的消息。而就起飞之前我还给他的太太令子 (Reiko) 发邮件，希望在我两天的研讨会结束后去斯坦福看望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突然离我们而去，终成遗憾。

青木昌彦 (Masahiko Aoki) 出生于 1938 年 4 月，在东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之后，于 1967 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赫尔维兹 (Leo Hurwitz)。赫尔维兹在 2007 年与我的导师马斯金 (Eric Maskin) 以及迈尔森 (Roger Myerson) 一起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奖原因是他们在机制设计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青木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他早期致力于微观经济理论研究。70 年代初回日本到京都大学任教，开始研究与日本经济和企业相关的经济理

---

论。1984年起受聘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担任讲座教授。

我最早听到青木这个名字是在 80 年代后半期我在哈佛经济系做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我对企业组织结构感兴趣，我的导师马斯金让我去读青木 1986 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企业的横向与纵向信息结构》(Horizontal vs. Vertical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the Firm)。时隔近 30 年后，青木去世的消息也是我在哈佛的研讨会上第一时间告诉马斯金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

我是 1990 年秋季学期到斯坦福大学任教的。从那个学期开始，在青木和米尔格洛姆 (Paul Milgrom) 的设计和推动下，斯坦福经济系开设了一个新的研究生学科领域，叫做“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简称 CIA)。取这个名字颇有讲究，其中三个关键词是“比较”、“制度”和“分析”，刻画出它的“新制度经济学”特性。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都是研究制度，但两者差别在于旧制度经济学多是描述性的，分析性不足。要有深入分析非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不可。在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理论获得重大突破，提供了分析制度的强有力的工具。80 年代的另一特点是经济更加市场化和全球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多元化逐渐显象，比如日本的崛起，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改革等，为制度比较，特别是跨国比较，跨文化比较提供了大量素材。这是建立比较制度分析领域的学术和现实背景。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CIDEG 理事兼学术委员钱颖一教授作主题发言

青木是“比较制度分析”最积极的推手。除了青木和米尔格洛姆二位资深教授外，最初斯坦福经济系参加这个领域有三名年轻教师，我是其中之一，另两人分别是一位经济史学者和一位苏联问题学者。这是一个有趣的组合：米尔格洛姆是微观经济理论学家，三位用经济理论应用于不同地区的有日本、中国、苏联，还有一位是研究欧洲经济历史的。每一个星期有一场学术研讨会（seminar），邀请经济学家围绕这个主题来讲论文，主要是来自校外的经济学家。刚进入 90 年代，日本经济仍处于顶峰时期，东欧和苏联的转型已经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从 1992 年开始呈现高潮。这些地区自然对新制度经济学尤其重视。所以这个领域从一开始就相当活跃。

在学术方面，这个时期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科斯（Ronald Coase）在 1991 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诺斯（Douglass North）在 1993 年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这两位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们的获奖

对“比较制度分析”领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之后另一位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新制度经济学重要贡献者是 2009 年获奖的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他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的发明人，他也是来参加“比较制度分析”研讨会的常客，他就在附近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

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有特殊地位，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突现的位置，远比在发达国家受到更大重视，这也很自然，因为发达国家的制度已经经过较长时期的演变，相对比较完善。我在 1992 写了一篇文章“国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前沿”，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上，其中就介绍了斯坦福的“比较制度分析”这一领域的情况。吴敬琏老师对此特别关注，经常引用其中的研究方法。1994 年夏天，我同米尔格洛姆到珠江三角洲访问，参观乡镇企业，访问大学。之后我又同他和青木到北京，参加了“京伦会议”。这两位推动“比较制度分析”的资深教授都对有了接触。

1994 年是我第一次同青木一起来中国，我把他介绍给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陈清泰、李剑阁、肖梦等中国经济学家。1994 年 8 月 23-26 日，国家经贸委与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楼继伟领导的“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有人将它与“巴山轮会议”相提并论，如果说“巴山轮会议”推动了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改革中的研讨，那么“京伦会议”就推动了微观经济学最新发展在中国的传播。

为了推动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研究，青木还推动 MIT 出版社开设了“比较制度分析”系列丛书。这个系列中的第一本是罗兰 (Gérard Roland) 在 2000 年出版的《转轨与经济学》，第二本是下面要讲到的青木在 2001 年的《比较制度分析》。

下面我简要介绍青木在比较制度分析方面的主要学术研究贡献。

青木的开创性贡献是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理论研究和比较日本经济与日本企业的制度结构。他那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企业的横向与纵向信息结构》是重要的原创性研究。这篇论文比较了两种信息结构和相应的



决策模式：美国企业中的纵向信息结构和等级制激励和决策机制，和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和“准树形结构”和横向协调机制。这篇论文推导出这两种信息结构导致的效率不同，取决于“基层”信息处理能力（即一线工人的水平）、信息传递技术、经理人员的专业能力等因素。与这一理论相对应的经验证据是日本丰田生产制度中的“看板制”（Kanban），即基于“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和“准时生产”（just-in-time）的库存控制系统。这篇论文以美国和日本企业为比较对象，并且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企业不同特性，在组织和制度经济学中有很重大影响，并为“比较制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必读内容。

在此基础上，青木在 1988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一书。中文版是商务印书馆 1994 年出版的《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这本书不仅分析了日本企业中的横向信息结构，还分析了日本企业中的级别等级制的激励方式，公司股权结构和银行作为持股人的监督作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机制，企业集团组织，以及政府组织和官僚体系与企业关系中表现的“官僚多元主义”等各种制度安排的经济含义。在这本书中，文化虽然重要，但是分析文化现象完全可以从经济理性和效率角度来进行。

这本书的开创性贡献在于青木运用最新进展的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理论来研究快速崛起的日本经济和企业——这个看上去与欧美经济和企业非常不同的组织和表现。这应该是运用微观经济理论解释并比较不同制度和组织结构的开先河之作。在此之前，人们对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感到振奋的同时，也对日本经济的组织方式感到很神奇。人们通常会认为日本的经济制度与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模式完全不同，更有不少人用日本独一无二的“文化”来解释日本经济和企业的运行。但是青木的研究工作是用一般性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来细致地比较和分析日本微观经济结构。

这个研究不仅使我们对日本经济和企业的运行获得了深入理解，同时也扩展和丰富了微观经济理论，因为这个分析需要对企业内部结构做深入分析，而在 80 年代或之前，除很少数的经济学家（比如科斯、威廉姆森、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外, 微观经济学的主流是研究市场, 而不是企业。青木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产业组织理论。

进入 90 年代, 青木与世界银行经济发展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四项跨国研究。这些研究基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 从比较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 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政策具有影响。

在我刚到斯坦福后不久, 青木就同我谈关于开始一项企业与银行关系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背景是日本的主银行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 主银行在监督公司管理层上具有特别的作用。这种监督机制不同于美国式的通过资本市场和收购兼并来监督大公司的管理者。由于在发展和转轨经济中, 资本市场通常都不够发达, 而银行系统通常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因此通过银行监督公司管理层就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选择。这项研究后来形成了他所编辑的, 于 1994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的主银行体系及其对发展和转轨经济的相关性》(*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 and It's Relevance for Developing and Transforming Economies*)。

青木主持的第二个研究项目是关于公司治理。在 1994 年的“京伦会议”上, 青木宣讲了他的论文《转轨经济中企业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治理结构》。会后我又陪他和哈特 (Oliver Hart) 去上海访问。正是在这次访问中, 我和他决定以世界银行研究所在 1994 年出版的《*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Insider Control and Roles of Banks*》一书为基础, 编辑出版一本中文的关于公司治理的书。这就是 1995 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本书应该是最早在中国出版的专述公司治理的书, 并首次提出了“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是“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应用, 它通常发生在股权高度分散的大公司中, 或在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中。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制度安排, 提供了解决“内部人控制”的改革思路。这本书在 90 年代影响了不少中国的经济学师生和经济学家。

青木主持的第三个研究项目以若干东亚高速发展经济为对象, 分析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经济学论著很多, 主要思路都

是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来看政府如何通过政策来纠正市场失灵，从而提高效率。但是青木从比较制度的分析框架入手，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分析视角，就是政府的“市场加强”作用 (market-enhancing role)。它超出了由于垄断和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的框架，侧重分析在制度不健全，产权不安全，信息不对称，金融市场监管不到位等情形中，政府干预不是为了简单地弥补市场不足，而是为了增强发挥市场的作用。所以，政府通过市场发挥作用，而非替代市场发挥作用。这项研究体现在 1997 年青木编辑，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一书中。

青木组织的第四项研究是后来在 2001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社区与市场》, (*Communities and Marke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这样，基于这四项研究的四本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比较制度分析中的应用研究系列：从金融到公司治理，从政府到社区和市场。这也是青木的一个长期规划，从市场经济中的各个方面来分析制度，比较制度。

与此同时，在 90 年代青木一直致力于运用博弈论来概括有关制度的一般性理论。这既是他在之前所做的理论研究的延伸，也是对他的四项应用研究的概括。它集中体现在 2001 年由 MIT 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专著 (*Toward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中文版是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在同年出版的《比较制度分析》。

这是一部宏大计划的书，试图用博弈论来全面概括制度研究。第一部分描述和分析制度的基本类型，从最原始的习俗性产权和社区，到中世纪长途贸易中私人秩序的交易合同，到现代企业组织和治理结构，以及作为政治稳定均衡的国家。第二部分引入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把观察到的制度现象解释为某种博弈的均衡，并由此研究制度变化的动态。这部分高度抽象，并连接文献中对制度的多种不同的研究成果，它最集中地体现了青木在比较制度分析上的理论贡献。第三部分分析制度多样性，比较多种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多种融资方式（比如银行与资本市场），比较不同的创新模式（比如硅谷）。青木对制度多元化的解释基于各种



---

制度之间的“互补性”(complementarity), 并且预测这种制度多样性将持续演化。

在 1994 年之后至今的 21 年间, 青木几乎每年都来中国访问, 同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同肖梦的友谊。在他们相识之后, 我记得有一天在斯坦福, 他兴致勃勃地拿了一本日文的有关中国“文革”的书来找我, 给我看密密麻麻的日文中有她的名字的汉字。青木年轻时曾是日本大学中的学生领袖, 很有革命激情, 并具有天下胸怀。这也许是他们之间“化学感应”(chemistry) 吧。

在青木的直接推动下, 在丰田公司的慷慨支持下, 2005 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建立了“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由陈清泰出任理事长, 青木与吴敬琏共同担任学术委员会联席主席。今天我们纪念这个中心成立十周年, 唯独缺少了青木教授, 实在是巨大的遗憾。

青木是在今年 7 月 15 日去世的。在此之前的 3 月和 4 月间, 他三次访问中国: 3 月 21-22 日参加中国发展论坛 (近年来他每年都参加); 4 月 5 日参加“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第 14 次学术委员会会议 (10 年来他每次会议都参加); 4 月 21-24 日他与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一起访问中国, 到外专局、《比较》杂志、清华公管学院做学术交流, 并在 4 月 23 日会见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4 月 24 日上午又到清华大学参加了学生社团的交流活动, 并为学生们写下了“新结合: Innovation for Students of Tsinghua”几个大字。他从中国回日本与百寿高龄病重的母亲做了临终告别, 然后返回美国, 之后就住进了斯坦福大学校医院。

令人震惊的是在他住院后仅仅两个多月就离开了我们。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推动比较制度分析领域并作出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 一位热衷于建立友好的中日关系的日本人。清华失去了一位坚定的支持者, 我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今天在他所创立的“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十周年的纪念会上缅怀青木昌彦的学术贡献, 制度建设贡献, 以及对中日关系的贡献, 是我们对他人生贡献的最好纪念。

## 星岳雄：青木昌彦的日本经济论

今天能够在 CIDEG 十周年庆祝典礼上讲话，我感到非常荣幸。CIDEG 是由青木先生最先提出的，今年十周年的庆典原计划在年初，我对此非常期待。可是青木先生却不在，我感到非常遗憾。但由于青木先生所做的贡献，还有许多青木老师的朋友都来到了现场，同时我能够在此就青木老师的一些研究进行发言，我也感到非常荣幸。



斯坦福大学教授星岳雄作主题发言

受到青木老师的影响，我也是研究日本经济的。我的学术生涯离不开青木教授，在哈佛大学时我曾拜读过他的论文，在 MIT 读到他的《企业合作博弈理论》（*The Co-operative Game Theory of The Firm*）。这本书中包括了横向和纵向信息的信息结构。这不是关于日本经济的书，而是一本涵盖更广泛理论的书。青木教授在本书中提出了，许多主流经济学提出的理论都能适用于日本经济，能够解释日本经济。

---

我最初的学术论文刊登在青木老师主编的杂志上，该杂志在介绍日本经济的杂志中最为出色。并且我本人在那之后，经青木老师介绍，也担任了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大约十多年。后来我到 UCS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任教。从那时开始，我就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和青木老师偶尔见面。参加了很多关于银行和公司治理研究的项目。那本翻译为中文的关于转型经济的书中也包括我的一篇文章。那本书对我来说非常值得纪念，其中的那篇文章也是我最好的一篇。感谢肖梦女士当时为我提供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很早就听过肖梦女士的名字，但是今天是第一次见到，我感到非常荣幸。

青木先生在斯坦福大学提出要重新振兴日本经济方面的研究，所以我的经济学研究生涯是根本离不开青木老师的。下面我主要介绍一下青木老师的日本经济学的研究。青木老师在日本经济学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家看第一页（资料），这些是青木老师与日本经济有关的一部分著作。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青木老师的研究领域从日本经济理论到主银行制度再到产业制度，并且也在其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通过这些研究的开展，青木老师承接了许多项目，包括像 CIDEG 以及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都逐渐成型。通过这些研究机构的活动，日本经济在青木老师的带领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青木老师之前的日本经济理论是怎样的？在之前，一般人都认为日本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所以普通的经济理论在日本不适用。80 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有人说日本是世界第一，给予日本高度礼赞；而反对的人则说日本没有尊重国际秩序。无论赞美还是批评日本的人，他们都强调日本的特殊性。但青木老师则不同，他用普通的经济学理论对日本经济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并非将这个理论原样照搬，因为经济学不是把理论原封不动照搬过来就可以用的，如果要照搬，可能有些现象不能得以说明，所以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经济学的局限所在。比如美国的经济学，是美国企业基于观察总结而来的，中国的经济学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就需要建构一个能够说明日本或者中国经济的理论，使经济理论得到发展，青木先生的贡献就在此。

现在的日本经济研究中还经常有人提出日本的特殊性，但绝大多数理论分析都已走向正规，强调日本文化特殊性的声音已经很微弱了，这方面青木先生的贡献巨大。使日本经济回到经济理论的轨道，而非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剖析，是青木先生做出的最伟大贡献。青木先生的研究涉及理论、制度和实证研究。首先是理论方面的贡献，早期的理论贡献刚才钱颖一教授已经介绍了，主要是关于机制设计的，尤其是关于大规模污染给社会带来严重影响的部分。与企业内部的分配或价格体系不同，日本大企业和美国大企业相比所采用的分配方法是，不仅仅在企业内部，而且在企业之间也采用非价格机制进行交易。比如，很多价格机制都是日本政府通过限价或对价格做出规定等方式来实现的，这是青木先生发现的，也就是说，日本的企业有一种非价格机制在侧面发挥作用。

到了70年代，青木教授曾有段时间从美国回到日本京都大学做经济理论的教学工作。那时青木先生向其他几位研究日本企业的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有关日本经济的东西。1984年，青木老师回到斯坦福大学时写了《日本经济中的信息、激励与谈判》（《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这本书。我认为这是日本经济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序言中，青木老师写到了对市场经济的微观结构这一教科书式的概念，我们必须予以批判性的研究。除此之外，想要完全了解日本经济，就必须跨越现有的概念限制，我想这实际上也是青木先生和钱颖一教授等人一起启动比较制度分析的一个动机吧。

因此比较制度分析的重要出发点是青木先生对日本经济的研究。在这方面钱教授刚刚提到了，我不再具体阐述，但是我觉得比较制度分析中有几个特点来自于青木先生对日本经济的研究。我举两个例子：第一，制度的补充；第二，比较制度分析中把制度作为内生制度进行研究，这两点比较复杂，我具体说一下。

首先，比较制度分析把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博弈过程，这个博弈是彼此之间互相都有联系的，并且形成了一个整体。我们把每一种博弈都分为一个领域（domain），也是一个维度，比如经济、社会等。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细分，比如在经济领域中有涉及劳工的、涉及金融的等等。在每一个具体领域中，都会形成一种均衡。均衡一般有两种，而最终哪一种均衡得到的更多的共识，那么这种

---

均衡就成为了制度。两个例子：比如第一个领域（domain）有一个 A 制度，第二个领域如果是制度 C 或者 D 的话，它会发展的更好。如果第一个领域的制度是 B 时，第二个领域的制度应该是 C 会更好些。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比较某一领域的制度和另一领域制度之间的互补性。青木先生最初在论文中提出“适度的互补性”这一概念，是关于日本主办银行所起的监督作用的，还有一篇论文是关于日本的常态分析的。

具体来说，青木先生认为日本的主办银行和企业之间有长期的关系。从融资前审查到项目结束后的审查，主办银行都进行了全程监控。如果企业财务状况良好，主办银行就不干预企业经营，主导权由员工中选出的内部人掌握；如果财务状况恶化，支配权就转移到主办银行手中，现有的管理层被迫下台，主办银行重新选择企业高管。青木先生将这一做法成为“常态依赖型的监控制度”。实际上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处理方式的不同，美国的信息处理是纵向的，日本的信息处理是横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治理结构的制度和信息处理的制度与企业制度之间，存在着互补性。米尔格洛姆教授提出了一个超级模型的学说，这一理论已经十分成熟，但其原型是青木先生首先提出的（比较制度分析研究）。

第二个青木先生对日本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就是内生制度的概念。关于制度的重要性刚刚钱教授已经说过，以诺斯教授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也已经提到了。这个制度是类似于法律或政治的制度，也就是经济生活外部的制度，用博弈论的话语来说就是博弈的规则。但是青木老师认为这种外部制度的概念是不全面的，这从日本经济中能看的非常清楚：主办银行制度或终身雇佣制度，这些制度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也并不存在明文合同。在比较制度分析中，关于制度的博弈反复进行，这其中为大家所共享的东西，青木老师称之为均衡。根据这个定义，制度中不仅有博弈规则，还有相关人员的行动，以及对这种行动的期待。这是青木先生在论文中提到的，这些制度是内生的，而且是由各个行动主体将这些制度作为外部约束而接受的。现在对于制度的变迁有了很大的重视，但是在比较制度分析中，首先对于制度的定义是不同的，比如随着环境的变化，均衡会发生变化。这样一来，大家的共识也会发生变化，最终就带来制度的变化。



---

青木老师在最近的论文中提到了亚洲经济发展带来的制度变化，并对此作了很多分析。今年去世之前，老师最后发表的论文比较了日本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这是和日本东京大学的钟玲教授以及钱教授一起准备完成的研究。

制度作为内生的一部分，这实际上也是基于青木老师对日本经济发展的分析和研究。比如对于日本过去二十年的经济停滞，我们通常说“失去的20年”，而青木老师不用这个词。他说不是“失去的20年”，而应该是转变的30年。人口的增长、资本的累积所带来的追赶型经济增长在70年代后半期就已经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老龄化和经济的成熟。日本正在摸索转型，因此老师说这是日本这30年的尝试。我想中国可能也正在面临或是将要面临一个转折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刚才提到机制的设计和比较制度分析等研究理论的提出，无论对日本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涵盖到了过去主流经济理论难以分析的内容。青木先生的研究解决了这一问题，正如刚刚钱教授讲的，青木先生在日本经济研究和普通经济理论的构建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日本领先全球走向了老龄化，并且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环境变化。日本应当如何应对这一变化，在审视显示的基础上，使比较制度分析得到进一步发展，是青木先生一直要做的事情。我们作为经济研究人员，尤其是日本的经济研究者，应当集成青木老师的遗志，将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谢谢各位。

**吴敬琏：**谢谢星岳雄教授。看来青木昌彦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值得我们深入去研究、去继承、去发扬的地方还很多，我们下面就转入讨论环节。我们现在开始进行自由发言，第一位是白重恩教授。

**白重恩：**青木先生于我亦师亦友，除了工作和学术上的一些交往，我非常有幸有两次跟他更深入接触的机会。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CIDEG 学术委员白重恩发言

第一次是 2011 年在中国举办的国际经济学会 IE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每三年举行一次, 当时青木先生是 IEA 主席。青木先生作为国际经济学会主席, 全面负责那次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会议, 我则作为会议的秘书长负责一些日常工作, 协助青木先生进行会议的组织工作。在那次会议的组织过程中, 以及会后把论文编辑、出版等环节, 青木先生的敬业精神都让我非常感动。每个环节先生都亲力亲为, 安排的细致周到, 特别是会后还需要编辑四本会议论文集。因为会议已经结束了, 参与人热情都有所减弱, 因此在论文集的编辑过程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青木先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令我非常感动。

第二次同青木先生的深入交流的机会, 是我在 2013 年去斯坦福访问的六个月期间获得的。在访问期间我能够有机会和青木先生多次探讨学术。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对我帮助很大, 甚至在生活上也给予我很多关照, 令我非常感动。

青木先生作为 IEA 会长发表了一个演讲, 其中谈到东亚的经济, 中国、日本、韩国的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重要阶段。一个阶段他称之为 M 阶段, 就是马尔萨斯阶

---

段，这段的经济增长与人口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但在这段时间内，生产率没有什么增长。第二阶段他称之为G阶段，是由政府在工业和资本的累积中起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是库兹涅茨阶段，包含着两个重要的转型：一个是人口结构转型，一个是产业结构转型。人口结构是随着抚养比的下降，人口红利不断增加。同时，产业结构的转型是从农业向非农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进行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效率得到了改善。第四个阶段是以人力资本的累积为基础的内生增长阶段。第五个阶段，青木先生称之为“后人口转型阶段”，这段时期人口红利被消耗完了，人口结构向老龄化转型。日本已经到了第五阶段，而在中国和韩国，还处于不同的阶段。青木先生的这一分析对我们思考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这其中有两点，我认为对于分析中国现在的情况非常有帮助：第一，就是中国政府在积累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结构的转型。要了解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这两点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现阶段我认为我们的结构转型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形态，这个新形态，从农业向非农业的结构转型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经济的影响也在逐渐减小。但是另外一个新的二元结构却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新的二元结构我认为应当划分为：政策扶持的部门与市场部门。为什么这个新二元结构对理解中国经济如此重要，新的二元结构跟老的结构有何关系？看上去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但是二者也有一定的联系。不管老的二元结构（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型的结构）还是新的二元结构（政策扶持部门和市场部门的结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素在两部门之间的转移，不是完全没有障碍的。两者都是由于要素在部门之间转移有障碍，因此造成了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这个新二元结构，可能还不能简单理解成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我特别用了“政策扶持部门”是因为有一些非国有经济也是同政策的扶持有很大关系的，比如我们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做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很多生产活动是由非国有企业完成的，这些生产活动也归于政策扶持部门，因为它们很多行为都受到了政府政策扶持的影响。

这个新二元结构能够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我觉得如果不考虑这个新二元结构，有一些现象是很难解释的，简单说三个现象：一个是通常情况

下，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时，资本成本或者实际利率会下降，因为经济增长乏力时，企业的投资积极性较弱，这时对资本的需求较弱，资本价格就会下降。但在中国正相反，从2009年至今，实际利率一直在上升。即使我们从2012年以来GDP增长一直都在下降，但我们的实际利率直到上个季度为止都在上升，这是通常的经济理论很难解释的。

另一个现象是劳动力成本。在同一个阶段下，我们经济增长下行，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但是我们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劳动力成本增长的速度仍然很快，这也是和通常的经济中所观察到的现象相反的。第三个是尽管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增长很快，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会造成通货膨胀，因为成本总是要传导到价格上。但是在中国不仅没有通货膨胀，我们甚至还有通货紧缩。今年不仅是我们的生产价格指数为-5.9，而且我们的GDP平减指数都已经为负了。

在劳动力成本高速增长，并且没有多少失业的情况下，竟然会有通货紧缩，这也是通常的经济理论很难解释的。刚才我所说的新二元结构，就能解释所有的这些平常很难理解的事情。之所以我们有这样的现象，是因为政策扶持部门占用了大量资源，积压了民营、市场部门的发展空间，所以尽管经济增长下行，其实经济增长下行就是由这一结构造成的。因为这样的结构效率很低，我们看到的是过去这些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下降，投资回报率也在下降，但同时资本成本还在上升，就是因为政策扶持部门占用了太多的资本和劳动力，因为他们占用了这么多资源，使得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同时由于存在这样的结构，所以我们的效率在下降，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下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同时，还会有资本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那么为什么还有通胀？为什么在成本上升的条件下还有通胀？因为我们政策扶持部门对成本非常不敏感，所以成本的上升并没有使得一些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他们还一直在市场中造成了产能过剩，造成了巨大的价格下行压力。当然经济向下的压力有一部分是外生的，来自于外界冲击，但是内部这个新二元结构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这样一个新二元结构除了可以解释上面三个通常的经济理论很难解释的现象

---

之外，也可以解释我们的高投资率、低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的低速增长、高负债率（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负债）、贸易顺差的变化、资本流动等现象。这个新二元结构，是和青木先生提到的，在我们的经济发展中五个阶段其中的两个阶段有密切关系的，也是根据青木先生的框架，我们应该实现从G阶段（政府起重要作用的阶段）到K阶段（库兹涅茨阶段）的过渡，然后再从K阶段过渡到H阶段（内生性增长阶段）。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因为外部冲击，从2008年以来，G阶段又回来了，就是政府在经济和资本积累中所起的作用又变得越来越大，这使得我们很难实现向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内生经济增长转型的目标。我觉得这是我们经济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现象，青木先生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在其理论基础上，用他的理论分析中国结构问题，同时青木先生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帮助。谢谢。

**吴敬琏：**我想补充一点，在3月25号青木教授这篇论文中，他明确的指出库兹涅茨过程的转折点，已经在21世纪初期出现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依靠劳动力从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来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而要寻找新的推动力量。有请下一位。

**李波：**我在1994年到斯坦福大学学习时认识了青木教授，那时刚到斯坦福不久，在楼道里碰到了青木教授，他很热情的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从那以后在过去这21年里，青木教授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2005年秋季学期，我还有幸作为青木教授的研究助理，在他的指导下，做了一些关于比较制度的研究，在五分钟内我想谈一个方面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李波发言

青木教授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认识到制度这个领域的研究对我们整个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青木昌彦教授关于制度的内生性解释，刚才星岳雄教授已经谈到。2012年阿西莫格鲁和鲁宾逊出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国家为什么失败》，在该书出版后不久，恰逢青木教授来北京，我们一起共进晚餐，我想听听教授青木教授对那本书的看法。青木教授对那本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同时也指出那本书的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在制度的内生性方面做更多的探讨，因为那本书区分的是榨取性的制度和包容性的制度，通过这两种制度的区别来解释很多国家经济表现的差别。但是这两个制度是怎么产生的？这两个制度是不是外生的？是不是给定的？作者没有回答。青木教授指出制度实际上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的。

青木教授给我的另外一个启发，就是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和变革的艰难。青木教授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complementarity，即所谓制度之间的互补性。很多制度不管是一个国家的公司制度、市场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他们之间是有互补性的。这就意味着要推动变革的话，如果只更改某一个领域的制度，可能

---

这个变革可能会失败，因为它和其他制度的其他方面可能不匹配。

我在 1995 年担任青木教授的研究助理的时候，他要我去读斯坦福的另外一位教授——经济学家保罗·戴维德在 1985 年发表的文章，就是所谓的打字机经济学。他研究的是为什么打字机这个键盘的 26 个字母，是这样一个没有效率的安排。因为实践证明如果我们重新排列那 26 个字母，我们可以提高打字速度 2-3 倍，事实上美国的军方还有一些机构早就不用那 26 个字母的排列了。但是为什么这 26 个字母的排列能够得以延续，直到今天也难以改变呢？保罗·戴维德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 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另一个概念叫网络的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基本理念就是，制度一旦产生之后有了惯性，就会形成一个网络，网络很大之后，如果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厂商想改变这一制度，它可能无法生存。因为这一网络十分巨大，而且网络之间有互补性，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洞见和观念，是青木教授非常重视的。他把这一观念引入了他对制度互补性的研究中，也就意味着制度的变革是非常困难的，制度的惯性和路径依赖性非常大。

2004 年我回国工作，青木教授非常鼓励我到中国的公共部门，政策部门去。我于 2004 年加入了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至今已有 11 年。在过去这 11 年中，青木教授每次见到我都鼓励我能够学有所用，能够把经济学的一些专业知识，一些在他的指导下所做的研究，能够用于我们公共部门的政策制定和推动制度的改革。

现在中国面临很多的挑战，我们可以用青木先生的观念来推动变革。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主要涉及几个重要的关系：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比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比如国内与国外的关系。我认为青木教授很多重要的研究，对下一步中国的制度设计和变革的推动都会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举一个例子：比如青木教授留给后人继续推动的——“制度之间的互动”研究。在过去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中国通过通过学习别人的制度、复制别人的制度，推动了很多改革。但是我们也发现如果复制了其他国家的制度的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个领域的制度，到了中国以后可能会水土不服，这实际上就是青木教授讲的制度的互补性问题。我们有没有配套制度的学习，有没有系统性的制度

---

考虑，还是我们只复制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比如我们的资本市场复制了发达国家的一些制度，但之后发现来用在中国有些水土不服，因此我们的资本市场还面临很多挑战。我们在制度的互补性方面做的是否足够，在资本市场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配套制度需要学习？这都需要从制度的互补性、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制度的变革如何通对外开放，和向其他国家的学习结合起来？在这些方面，我相信青木教授的很多研究能够继续帮助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改革和制度设计。

最后，作为青木老师的学生、作为后辈，我认为青木教授有三个方面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第一是他的好奇心，第二是他的敬业精神，第三是他不断挑战自我的勇气。青木老师曾经告诉过我说，他年过半百才开始学习新的博弈论，感到很多非合作博弈的概念对他来讲很有挑战性。但他还是拿起一本本厚厚的博弈论书在那里啃，这种不断挑战自己的勇气我觉得值得我们后人学习。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周黎安：**我在 1996 年到 2002 年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青木昌彦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导师。所以青木作为导师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那六年，还包括毕业之后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有非常密切的交往，他对我影响很难用简单几句话来描述，但我想简单概括一下。我觉得青木老师影响我的不仅仅是他博大精深的思想，刚才钱颖一教授、星岳雄教授，包括几位专家都已经从各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学术思想，我自己作为跟他接触比较多的学生，也能亲身感受到他对真理、对于新的知识、对于学术、对事物本身的真相的追求，他的执着和热情让我感到非常敬佩。今年 4 月份他来清华开会，那时他特别兴奋的告诉我，他有一篇文章刚刚投给了《经济增长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美国一份影响很大的宏观经济学杂志)，收到了四个 review report，有四个评审人给他很厚的评论，主编要求他修改。当时我觉得非常的吃惊，因为他已经 77 岁高龄，还在写这种学术论文，还在向这些杂志投稿，而且还要面临来自评审人各种各样非常刁难的问题。但是我从他的反应里面看到的是他的兴奋，以及他想进一步修改的坚定，所以我觉得这是他给我留下的非常重要的精神上的影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发言

在我们之间的交往中他的热情、正直和单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今天时间很有限，所以我想集中谈一个事情。我在斯坦福读书期间帮他翻译了他的《比较制度分析》这本书，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缘让我去了解青木。

我接触这本书的翻译是在 1999 年的暑假，当时青木老师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他正在写的一本书。我一看这个书的题目和内容我都很感兴趣，并且我看到他已经有了初稿，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就答应了。但是后来证明这个翻译过程非常艰难，因为那时候的手稿对青木老师来讲还是一个初稿，他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在修改，我的翻译也跟着一直在修改，因此总共花了两年时间才把这本书给翻译出来了（这本书最后是 MIT 2001 年出版的，中文版是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在 2001 年几乎同步出版）。但这也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在不断的修改过程中，不断跟青木老师交流，包括怎么翻译。向他讨教的过程中，也确实对书中写的很多东西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的感觉是，这本书确实是一本非常雄心勃勃的集大成的著作。所谓集大成体现在，当读那本书时，你能感受到青木教授



不仅把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还把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哲学还有很多其他学科里的一些非常前沿的、对于经济学家来讲属于别的学科的知识，都做了非常仔细的整理和介绍。从这一点，就反映出青木教授不仅博学，更重要的是他具有一种对知识的态度。我个人的体会是，经济学家总体来讲比较狭隘，只关注自己的研究，对外部其他学科的研究相对不太在意。而青木先生不是这样，他像一个学生一样。刚才李波也讲到，青木先生有一种持续学习的态度，别的学科中只要与制度研究有关的一些最新发展，他都会去研究，并且吸收到著作中。现在各个学科爆炸式的增长，作为经济学家，怎样在学科之间互相学习，我认为青木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认为这些反映了青木先生对知识非常真诚的态度，他没有学科的偏见，更多考虑的怎么去汲取不同学科的启迪和智慧，然后再把这些知识融合到经济学中。所以这是我在翻译这本书当中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当然这也给我的翻译制造了很多困难，因为里面有很多术语相对来说不太熟悉，但是确实让我感到青木先生对待知识的态度。

另外，在这个书中读者能感觉到青木的分析仍然体现了一个经济学家的严谨。他不仅把不同学科的概念、不同学科中观察到的现象——只要是与制度有关的一一都非常系统的整理起来，但更重要的是他运用博弈论的语言、用经济学统一的分析框架，把这些不同的现象、或者不同学科的东西都进行了经济学的改造。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有一个很著名的教授叫戈恩·维特，他在1985年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嵌入性（embeddedness）。这一概念是说，经济制度、经济现象其实是嵌入在整个社会制度当中的，实际上戈恩·维特的意思就是你们经济学家研究问题只看到了经济方面，没有看到背后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经济学家没有对把经济嵌入在它所嵌入的环境进行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青木先生的书中，他用经济学里的关联博弈（linked game）的概念，重新去解释这个嵌入性的含义——嵌入性怎样化为一个可以真实分析的概念。总之，青木先生实际上把别的学科里的知识用经济学的语言，对它们进行一致性的整理和发展，使其变成经济学可以用到的工具（而不是简单的把知识汇集到这本书中）。这也是他这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把不同学科的知识最后都整合在用统



一的经济学解释的框架中。刚才钱颖一教授和星岳雄教授都提到了他这方面的贡献。我今天早上还特意查了一下 Google Scholar Citation,《比较制度分析》是青木先生所有发表当中引用率最高的一本著作, 引用次数是 2406 次。Google Scholar Citation 是反映文章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如果它的引用超过一千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 青木先生这本书是 2400 多次, 排在后面的是先生对日本企业的研究, 被引用大概 2300 多次。

这本书的影响一方面可能反映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一研究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影响。青木先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 不仅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还推动了其他学科对于经济学知识的传播、理解, 以及在怎样拓宽知识的外延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我后来的研究也得益于跟青木先生的交往, 可以说从他的比较制度分析中直接受益。比如 2008 年, 我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蔡洪滨教授和一个浙大的学生, 借鉴了青木的比较制度分析, 包括像 M·格瑞夫有关不同中东地区不同的商帮的研究, 以及钱颖一教授的转型国家中关于中国、俄罗斯的比较, 还有米尔格洛姆、罗伯斯的互补性理论等。我们把互补性有关的东西用于分析中国的明清时期, 晋商跟徽商治理模式的比较, 结果发现这两个商帮在明清时期可以说影响是一样的。这是中国号称十大商帮里影响最大的两个商帮, 在商业上一样的成功, 但我们发现这两个商帮一南一北, 他们的治理模式差别非常大: 徽商更多靠血缘和宗族的关系, 将人整合到商帮当中, 所以徽商商帮中没有太多明文的契约或者很强的激励体系; 但是晋商采用了相对非人格化的方式, 建立号规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上。为什么这两个商帮会不一样? 一是研究商帮治理的两个模式的系统差异, 更重要的是把系统差异跟他们当地的地区的区域性的文化、包括区域性的制度条件结合在一起, 结果发现, 商帮治理的很多元素是跟外部的文化理念和外部的制度条件(比如说宗族制度在中国地区间的差异)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嵌合或者互补。所以我们利用这个互补的概念, 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商帮: 第一, 他们会形成系统的差异; 第二, 为什么两个商帮看上去治理模式差别那么大, 但是却同样成功。因为他们都实现了对周边的制度元素或者说条件的一个非常好的组合, 所以它们都

---

能变成一个有效的治理体系。我认为我们这项研究可以说是直接受益于来自斯坦福比较制度分析 group 的影响，包括青木先生自己关于日本和美国企业的比较的研究。

另一方面，我从自己博士论文开始，就一直关心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制度。其实晋升制度的研究也是从青木先生这里直接受益的，为什么？因为青木先生跟我讲过，日本和美国企业，两者都是现代企业，但是日本企业中的人力部门相对来说权力很大，而美国企业人力部门的领导权力相对来说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员工都在企业内流动，所以员工的晋升和部门间的调动就变得非常重要。而美国企业的员工跳槽相对容易，在这个企业中员工感觉没什么晋升空间，就会马上到别的企业中去，所以美国企业人力部门对一个员工的影响远不如日本企业中人力部门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其实就是人事制度的差异。中国的官场或者说地方官员在政府的体系里面，其实跟日本的锁入 (lock-in) 到那个体系 (system) 中很像——也像是终身雇佣，所以官员的晋升路径、晋升前景对他的激励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是直接从青木先生的研究当中，注意到“晋升”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下（像日本企业一样），可能会扮演很特殊的一个角色。这也是直接从青木先生的研究中受益的例子。

总的来讲，我觉得青木先生对我来说是高山仰止，他的学术贡献我当然没办法企及，但是我能够感受到他的伟大。另一方面，作为他的学生、作为后辈，我还是想把他作为学习榜样，把他的精神——他的学术思想和他对真理、对知识的态度，他的追求的精神，还有他的为人之道，继续传承下去。作为青木先生的学生，我的责任很重大。未来我肯定还会不断的受益于来自青木先生的教诲，所以也希望我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能够把传承青木先生精神的工作做的更好，谢谢大家！

**车嘉华：**我叫车嘉华，现在复旦大学教书。本来是差点要来清华的，但是因为受父母之命——一家在上海，所以还是去了复旦。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车嘉华发言

我谈几个方面，首先我们看青木老师的工作的话，应该有两条线：第一条线，就是投身于很多社会实践，尤其是亚洲社会的实践当中。在这当中，他帮到了社会的同时自己也学到了很多。另外一条线，就是他的纯学术工作，尤其是比较制度研究。我认为青木老师的比较制度研究可能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他研究日本的体制；之后到 2001 年，他又对比较制度有一个相对综合的整体分析；生命的后阶段，他通过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辛亥革命的比较，希望更多的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而不是从制度本身进行分析。所以，他在 2001 年的文章中提出了对制度的不同理解，我想在此强调一下。

稍后我会讲到“比较制度分析”和现在经济学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什么地方。那么制度是什么？传统意义上来说，制度就是游戏规则，青木老师和很多在比较制度经济学里深入研究的老师一样，强调制度的互补性和制度的均衡。新制度经济学与之相比，是把制度压缩成一个单面的东西：包容还是不包容，

掠夺还是不掠夺。而青木老师对日本经济体制的分析，内容相当丰富，不会讲制度压缩成单一维度（single dimension）来进行比较，而是要研究制度如何内生或者均衡存在的。青木老师在 2001 年的书中也讲到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因为虽然“比较制度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都进行比较，但是比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青木老师认为在“比较制度分析”中，比较的目的是研究一个经济体中，不同制度的不同层面是如何互相契合的，而不是单纯的用一个国家的好制度，来说另一个国家的制度不好。青木老师研究的是在这个国家的文化社会环境中，制度是怎样互补、怎样内生存在的。

当然这个说法带来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被现有的制度、被我们的过去所捆绑住了？后来青木老师做了很多制度互补性（complementarity）的问题，我想后期青木老师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制度怎么向前沿革。如果只是谈互补性就很难讲向前沿革的问题，所以青木老师在 2001 年的书中，把比较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理解成一种均衡的游戏。他认为我们要把制度这个概念再提升一步，提升到什么程度？青木老师认为，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制度在变迁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革命和社会动乱，但这是制度变迁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从一个制度跳跃到另一个制度，很多现存的游戏规则会完全被打破。要真正理解制度，就要有一个在规则之上的更高的层次的概念。因此青木老师在他 2011 年的书中这样定义制度：制度首先是一种人对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怎么进行博弈的一种信念。但是这种信念在人与人之间不一定相吻合，也不一定共享。等到这个社会达到一定的阶段时，大家想的和现实中的结果差不多，并且大家的想法都基本一致的时候，我们的制度就形成了。英文来说就是“A sustained system of shared believes how the game is played”（共同理想）。但是青木先生为什么绕这么大的弯来阐述制度，我认为他要我们有这样一个概念，在有制度或者制度混乱的时候，这一概念都能够涵盖到。所以会说“A sustained system of shared believes how the game is played”。因此刚刚周黎安提到的青木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关于制度变迁的。

去年（2014 年）11 月底青木和令子（青木夫人）到香港，恰好我也在。青木

---

老师跟我讨论了那篇文章，令我印象深刻。老师那么大年纪，以前写文章都是用 Microsoft Word，那时候他让我教他用 LaTeX 来编辑文章，这么大年纪开始学习 LaTeX 是很不容易的。今年 5 月底，因为他有一个重大的手术。当时希望青木老师在手术前有很好的休息也从来没有给他打一个电话。手术比较成功，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青木老师在手术前，把工作的所有东西一股脑的都发了过来，手术完成后没几天他又开始工作了。他工作的效率比我要高得很多，我有时候与他对接不上，感到非常大的压力。当时一直想去看青木老师，但由于各种各样情况就拖下来了，一直拖到 6 月底。青木老师 6 月底给我一个 E-Mail，说来回中美之间飞机也很辛苦，让我特别注意身体，安排好再去。我当时就把这个计划推迟了，到后来就再也来不及。

整个过程中，对我来说一个最大的遗憾，是在一个多月里没有跟青木老师说上话，最后赶去的时候，也来不及了。我感受到，青木老师在最后的时刻，是在跟生命赛跑。他工作非常非常之勤奋，所以我后来为青木老师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就是“Till his last breath”。因为青木老师由于肺的问题过世的，所以我文章的最后引用了“Life is not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breaths we take, but by the moments that take our breath away”。谢谢！

**薛澜：**我从 2003 年开始跟青木老师结识，从学术思想来讲，经济学家受到青木老师研究的影响很大，而我们（非经济学家）对青木老师的理论和思想的学习还非常有限。但刚才大家提到的几个概念，其实对我们研究公共管理的学者也有很大影响，所以刚才提到的（青木先生的文章有）2000 多的引用，我想研究公共管理的学者可能要占其中一部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CIDEG主任薛澜教授发言

青木先生对公共管理研究的影响，第一个是关于制度变迁，也即把制度看成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博弈策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研究公共管理、研究制度变迁的学者其实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研究的时候，是把制度看成一个从政策专家、法律专家那里形成的某些条文，这是相对比较固定和死板的定义。青木老师把制度看作一种策略，使我们能更好的理解制度变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因为每一次制度变迁的背后，实质就是策略的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影响。所有我认为，青木先生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当前的公共治理体系改革有很大的启发。

青木先生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关于互补性（complementarity）的概念。最近提的比较更多的是公共治理体系中政府、企业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原先我们仅从功能的角度来区分政府该做什么、市场该做什么以及社会能做什么。这样单独地进行研究，现在看来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不是天生按照理想设计进行组合的，它（制度）实际上都在历史的演变中形成了这种咬合性

---

（或互补性）。所以这种思路的调整不是简单的对功能的重新认识，而是在不同的咬合性（互补性）中怎样去调节。这样的调整是三者之间同时的改进，我认为这一点对我们研究公共治理体系，尤其对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启发。

我同青木老师的相识，缘于CIDEG（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从中心的筹备之初到成立之后，我和青木老师结识已达十余年。第一次见青木老师，他给人的感觉比较严肃，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者，后来这一点我很快就体会到了。首先是为中心起名字，这个名字当时让我们颇费了一番周折，青木老师为CIDEG这个名字花了最多的心血，包括它的英文简称。青木老师一再说，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简称，这样易于传播。之后，是关于CIDEG的章程。很多研究机构的理事会、学术委员会，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是CIDEG的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却真正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是在章程设计伊始，青木老师在一封封邮件的往来中，对很多关键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并且我们最后非常严格的按照章程执行的结果。刚才白重恩特别谈到IEA会议的筹备，在之前关于环境治理的研讨会上，青木老师为了邀请的学者名单和议程同肖梦和我一起非常仔细的认真讨论了好几次。青木先生这种特别严肃、认真的精神，其实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信念。

在同青木老师有了更多的接触之后，我感觉他确实像前面发言的人们讲的，兴趣非常广泛，思路很新颖，好奇心也非常强。其实在CIDEG的很多研究中，许多项目并不是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但是青木老师对这些研究非常鼓励。记得我们第一次举办青年学者的论文竞赛时，青木老师非常认真的一篇篇文章的看，最后入选的两篇其实都不是做经济学研究的。有一篇是（郑思齐）的论文，她做的不是经济学的研究，但是青木老师对这篇论文非常肯定。之后我们（CIDEG）有很多研究都是从其他领域来研究公共政策和环境治理的问题，青木老师都非常支持。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说，他是一个始终充满好奇心，毕生对各种学术问题追求探究的学者。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愈发感受到青木老师博大的人性，以及他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CIDEG每次开年会时，大家会讨论各种各样非常广泛的问题，青木老师

也稍微懂一点中文，有时候他也会参加我们的一些讨论。有一次与青木老师交往的场景令我印象深刻，有次我去斯坦福开会，青木老师要请我吃饭，然后他开着一辆比较时尚的车从酒店接上我，带我在斯坦福周围逛了一圈，还介绍了硅谷旁边律师楼的一些故事。青木老师对我们大家的关照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刚才白重恩也谈到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青木老师，我想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我们继续把这个中心，把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创立的CIDEG给办好，让它（CIDEG）真正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中心，以告慰青木教授的在天之灵。谢谢大家。

**赖海榕：**我是90年代末同青木先生认识的，那时是因为肖梦老师的引见。青木先生来中国多次，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行程我都有参与，他那深厚的学养和君子般的人格令我十分敬仰。



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副主任、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赖海榕发言

---

我的父亲和青木先生年龄相仿，今年初春我的父亲辞世，仲夏青木先生离世，所以今年我有着不同一般的悲伤。对青木先生的纪念，很多人写了很多评论文章，有一篇评论文章说的非常好，刚才薛澜老师也提到了，对青木先生最高的敬意和最好的纪念是行动起来，推进和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非常惭愧，我很早就因为害怕经济学的艰深，而逃离到了政治学领域，当然不是说政治学就容易。青木先生说中国虽然有特别之处，但并非那么特别。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东亚其他国家有很大相似之处，这点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因为在从事中国政治的研究过程中，应该把中国放在怎样一个参照系上去观察，是非常困难的问题。青木老师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刚才好多学者也讲到，青木先生的思想并不局限于经济学，他博大精深的著作（如比较制度分析），是关于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演变和变迁的非常深入的研究。我认为现在特别有必要再一次重新研究一下青木先生的学说，为什么？因为近年来，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东方的一个大国，很多的政治发展出现了许多出人意料的情况。很多过去有办法解释的事情，忽然变得比较难解释。用过去的一些分析框架和知识都不是很好理解，所以此时，如果能够重读、再次深入的研究青木先生关于制度变迁、制度演进的学说，可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谢谢。